

研究论文

DOI: 10.63221/eaha.v1i03-04.120-132

亮点:

- 基于世界文明史与城市发展史两大体系，梳理了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采用全球化视野，对比了古今中外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演进历程与空间形态。
- 提出“文明-城市”关联发展规律，深化了对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整体性认识。

*通讯作者邮箱:

wuyan2013@ucas.ac.cn

英文引用: Bai Jialin, Gao Bingxu, Wu Yan, 2025. Exploration and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City" in World Cultural Center Cities. Evidence in East Asian Humanities and Arts, 1(03-04), 120-132.

中文引用: 白佳林, 高炳旭, 吴艳, 2025.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文明-城市”发展史探析与启示. 东亚人文艺术研究, 1 (03-04), 120-132.

稿件处理节点:

接收	2025年12月09日
修订	2025年12月20日
接受	2025年12月22日
发表	2025年12月25日

基金资助:

国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世界艺术中心城市形成与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25ZD04）。

版权:

本作品原创内容可依据《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条款使用。任何对本作品的后续分发须标明原作者及作品标题、期刊引用及DOI信息。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文明-城市”发展史探析与启示

白佳林¹, 高炳旭¹, 吴艳^{1,*}¹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 各文明的核心要义常依托城市物质载体形成“文化中心城市”。本文基于世界文明史与城市发展史两大体系, 分析了文明进程与城市演变间的关联性, 以总结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首先, 以洲际空间与历史时序为两条线索对世界文明史进行梳理: 一是各洲文明与城市的格局变迁; 二是文明历程与城市职能演进。其次, 从国内外两个方面, 分析了城市发展史: 一是国外历史进程与城市要素归纳; 二是中国历史脉络与营城特点总结。再次,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探讨了文明发展对文化中心城市更迭的推动作用, 及建成城市对文明演变的进一步影响效应, 最终总结出“文明-城市”关联发展规律。以深化对文化中心城市形成与变迁机制的整体性认识, 并积极推动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工作进程。

关键词: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 世界文明史; 城市发展史; “文明-城市”关联规律

Exploration and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City" in World Cultural Center CitiesBai Jialin¹, Gao Bingxu¹ and Wu Yan^{1,*}¹ School of Sciences for the Habita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the core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has often relied on cities a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Cultural Center Cities." Based on the two main systems of world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izational progress and urban evolution. The goal i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global cultural center cities. First,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along two main lines: continental scope and chronological time. One relates to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civilizations and cities within each continent; the other concerns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al stages and urban functions. Second,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One entails identifying elements from foreign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their cities; the other involves summarizing traits based on China'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ity-building practices. Finall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drives the succession of cultural center cities and the further influence of built cities on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ultimately synthesizing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the "Civilization-City" correlation. This deepens th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enter cities and actively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center cities.

Keywords: World Cultural Center Cities; World Civilizations History;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Civilization-City" correlation

1. 緒論

纵观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变迁，其历程既是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也是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文明为城市提供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城市则以其物质空间和社会结构承载并延续文明成果。二者相互推动、相互塑造，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世界文明史与城市发展史两大体系，探析“文明-城市”关系下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演化机制。

1.1.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研究

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是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学界普遍认为，文化中心城市不仅是文化资源的集聚地，也是国家形象与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部分研究以国外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的发展模式，总结其文化政策、产业体系与城市品牌建设机制^[1]；关于国内城市的研究则集中于以北京为主的文化中心建设，主要探讨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与文化引领作用^[2, 3]；此外，亦有学者关注文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治理与区域协同^[4]，聚焦文化中心与文化贸易、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5]，以及从历史视角分析其形成的社会基础^[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但多数聚焦于城市的当代建设层面。本文所探讨的“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并非一个静态、普适的现代标签，而是具有动态内涵的空间范畴。即在特定历史与地域语境中，对文明的核心要素：如价值观念、知识体系、艺术形式与制度模式等承担形成、集聚、传播等关键作用的城市载体。以此为基点，从历史与演变的角度探究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化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

1.2. 世界文明史研究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明史研究经历了从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叙事到多元互动的全球史转型。在世界文明演进的体系构建方面，《世界文明史》^[7]、《全球文明史》^[8]等著作系统梳理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强调文明在地理、制度、宗教、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交织。同时，近年来不少研究提出应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重建以多元文明为主体的全球文明史观^[9]，研究趋向以“文明互鉴”、“平等交流”为核心理念，主张在多元文

明互动中重构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逻辑^{[10][11]}。此外，学者们尝试引入考古学、制度史、出版史与艺术史等跨学科方法，推动世界文明史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多维解释^[12]。

总体上，世界文明史研究已形成以多元互动和文明互鉴为核心的整体史观，但在文明演进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制方面仍有待挖掘。

1.3. 城市发展史研究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关键标志，是文明成果集中汇聚之地。城市史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脱胎于社会学，在二战后确立^[13]。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在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迅速发展，并出现了《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14]、《全球城市史》^[15]、《欧洲城镇史》^[16]等论著。在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国内城市史研究的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其中以《中国城市建设史》^[17]、《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18]等专著为代表。

城市史是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城市化的过程”的学科，多关注于城市形态发展与变化背后的历史进程与动因，将城市置入其所在的时代背景和文明语境中进行研究。而城市本身作为文明高度集中的空间载体，其空间形态为市民文化活动提供了导向，并进一步作用于文明演进的进程。因此，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是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2. 世界文明史：文明驱动文化中心城市更替

为探究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首先需要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全球文明格局中进行分析。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世界文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多样化的演进特征（表 1）。

由此看出，各大洲文明历程虽路径迥异，但均经历了从孤立到互动、从古典的辉煌到近代的碰撞，再寻求现代转型的过程。地理区域上，亚欧大陆因交通便利交流频繁，部分大洲受海洋阻隔独立发展，后期受外力推动进入全球体系，现代全球化正朝着更深层次的互动与再平衡发展；时间阶段上，文明演进过程在时间轴上呈现加速态势，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开始，从神权社会到王权帝国，再到民族国家与全球资本时代，文化交流、技术革命是推动时代转换的关键。

同时，宏观的文明历程驱动了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形式、迁移与功能演变。不同大洲的地理格局与文明发展阶段，共同决定了文化中心城市以宗教中

心、帝国都城、贸易港口、艺术之都等形式进行更替的多样路径。

表 1 世界文明史历史事件梳理表

时间阶段	非洲	美洲	大洋洲	欧洲	西亚	南亚	东亚
远古至 B.C. 3000 年 人类迁徙与早期定居	巴达里文化 纳尔迈调色板 努比亚	人类迁入北美、南美	澳大利亚原住民定居 卡卡杜岩画	基克拉泽斯文化	乌鲁克时期	梅尔伽赫文化 阿姆利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B.C. 3000—B.C. 1000 早期国家与帝国萌芽	古埃及古王国 胡夫金字塔	奥尔梅克前驱；查文文化萌芽	澳大利亚原住民	米诺斯文明 迈锡尼文明	阿卡德王国	哈拉巴文化	夏朝 商朝
公元 B.C. 1000—500 古典文明兴起	迦太基	奥尔梅克文明；查文文化(特诺奇蒂特兰)	澳大利亚原住民	希腊城邦雅典民主	亚述帝国	十六雄国 佛教诞生	周朝 秦汉 日本古坟时代
公元 500—1450 年 中世纪与跨洲互动	加纳帝国 马里帝国	玛雅古典期 印加萌芽(库斯科、利马)	澳大利亚原住民 新西兰 波利尼西亚人定居	拜占庭帝国	阿拉伯帝国	笈多王朝	隋唐 宋元
公元 1450—1750 年 大航海与帝国扩张	桑海帝国 贝宁王国	阿兹特克印加	荷兰登陆 悉尼殖民点建立	文艺复兴 荷兰东印度公司	奥斯曼鼎盛	莫卧儿帝国 泰姬陵	明朝 清朝
公元 1750—1914 年 工业革命与民族国家	祖鲁王国 埃塞俄比亚 阿杜瓦战役 欧洲瓜分非洲	美国独立 拉美独立 (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 新西兰怀唐伊条约	工业革命 法国大革命	奥斯曼坦志麦特改革 苏伊士运河开通	英属印度确立 民族大起义	鸦片战争 辛亥革命
公元 1914 年至今 全球化与现代转型	1960 “非洲年” (17 国独立) 非盟成立	硅谷崛起 墨西哥革命 巴西利亚迁都	悉尼歌剧院 堪培拉首都	世界大战 欧盟成立 柏林墙倒塌	OPEC 成立 哈利法塔	印巴分治 孟加拉国独立	民国建立 抗日战争 深圳特区 浦东开发

(来源：据参考文献[7]、[8]整理)

2.1. 洲际文明格局与文化中心城市的变迁

2.1.1 内生发展、外力介入的非、美、大洋洲重心转移

非洲撒哈拉以南、美洲与大洋洲受地理位置隔绝影响，文明体系呈现出更强的独立性与阶段性，文化中心城市的更替相对缓慢。

其文化中心城市演进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地理隔绝下的内生发展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侧重于本土文明要素的形成与内部集聚。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文化重心多沿资源带与商贸路线分布，马里帝国时期的廷巴克图^①因跨撒哈拉黄金贸易而兴盛，

^① 廷巴克图 (Timbuktu)：位于今马里共和国，14—16 世纪是西非的伊斯兰学术与贸易中心，后因贸易路线改变而衰落。

14—16 世纪成为伊斯兰学术与宗教中心；美洲玛雅文明时期的蒂卡尔^②和奇琴伊察依托农业与祭祀体系逐渐发展，形成区域文化核心；大洋洲的文化中心则更具分散性，乌鲁鲁^③的圣地与卡卡杜^④的岩画艺术序列取代了传统城市功能，以宗族与梦幻时光信

^② 蒂卡尔 (Tikal)：位于今危地马拉，是玛雅文明古典时期（约公元 250—900 年）的重要城邦。

^③ 乌鲁鲁 (Uluru)：位于澳大利亚中部，是阿南古人 (Anangu) 世代的核心圣地。其巨岩本体及周边环境是“梦幻时光”(Dreamtime) 创世叙事中的神圣景观，历史上是跨区域仪式、贸易与信息交换网络的枢纽。

^④ 卡卡杜 (Kakadu)：位于澳大利亚北部，考古证据表明其持续人类居住历史超过六万五千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岩画艺术序列，记录了环境变迁与文化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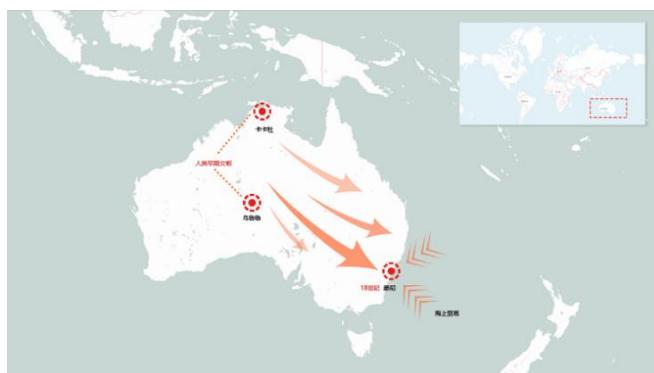
仰体系维系社会秩序。二是外来影响下的中心转移阶段，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被打破，文化中心的内涵转向对外来文明的接收与传播。17世纪，非洲的海岸城市开普敦在荷兰殖民影响下成为重要港口与经济门户；美洲由阿兹特克人建立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①，在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入侵后改建为墨西哥城；18世纪，欧洲人在大洋洲建立悉尼等港口城市，该区域首次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中心。



图1 非洲文化中心城市变迁示意（审图号：GS(2024)1158号，底图无修改）



图2 美洲（局部）文化中心城市变迁示意（审图号：GS(2024)1158号，底图无修改）



^① 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阿兹特克帝国首都，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改建为墨西哥城。

图3 大洋洲文化中心城市变迁示意（来源：作者自绘）

非洲撒哈拉以南、美洲与大洋洲的文明因相对独立而保持长期稳定，其文化中心城市的演化节奏缓慢而封闭，主要受内部生态环境变化或宗教政治权力更迭影响；当外来贸易与殖民扩张打破地理隔阂后，文明中心的空间格局出现由内陆向沿海、由封闭向开放、由内生向互动的演进趋势（图1—图3）。

2.1.2 多元交流、复合驱动的欧洲中心更替

欧洲因地理区位开放、海洋交通便利，处于文明交流的交汇地带，成为文化中心迁移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其文化中心城市的更替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治整合推动下的古典文明奠基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侧重于原生文明价值与制度模式的形成。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因地中海贸易的繁荣与民主制度的确立，形成以理性思辨与艺术创造为核心的城邦文化，成为古典文明的象征；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创新构建了覆盖地中海的城市体系，其规划理念演化为后世的空间范式，文化中心由此转移至亚平宁半岛。二是宗教秩序引导下的人文重构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转向神学或人文知识的集聚，以及新思想的创造。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封建分裂时期，文化中心北移至以教会为核心的地区，君士坦丁堡成为东地中海的宗教与文化中心，而西欧的巴黎则因12世纪大学教育与基督教的发展逐渐崛起；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贸易复兴与市民阶层壮大促使文化重心再次南移，威尼斯依托海上贸易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门户城市，佛罗伦萨在金融资本与人文思想的推动下，演化为思想解放的象征，欧洲文化由神权转向人本发展。三是全球扩张驱动下的现代转型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侧重于现代文化的全球传播。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进入全球扩张时期，文化中心由地中海地区迁移至北欧沿岸，伦敦依托港口优势与殖民体系发展成为世界性都会，其博物馆、图书馆与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推动了知识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柏林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崛起，成为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中心。

欧洲文化中心城市的迁移路径大致经历了“地中海东岸—意大利半岛—北欧沿岸”的格局，体现出自然地理、贸易网络、政治结构与思想革新交织的综合驱动机制（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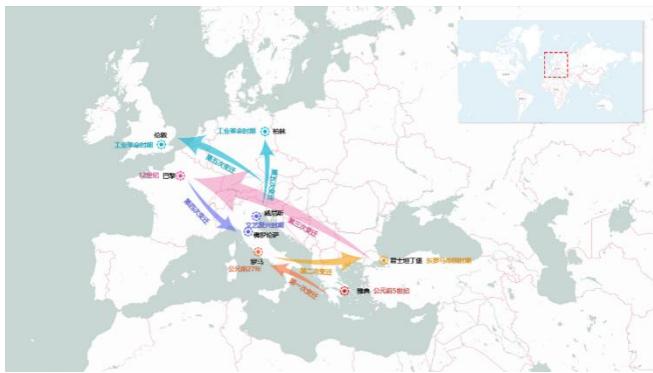


图4 欧洲文化中心城市变迁示意（审图号：GS(2024)1158号，底图无修改）

2.1.3 文明汇聚、陆海互动的亚洲多极格局

亚洲因地理环境复杂、陆海交通并行，形成了多文明并存、区域文化交汇的格局，文化中心城市呈现出多点互动的特征。

其文化中心城市的变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地理环境主导下的农耕文明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侧重于古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巩固。两河流域的乌鲁克^①与巴比伦依托平原肥沃与交通便利的优势，逐步发展为西亚的政治与宗教核心；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②与恒河流域的巴塔利普特拉（今巴特那）^③，以水系与城防布局成为南亚城市典范；黄河流域的洛阳与长安自西周至唐代长期影响东亚文化格局，奠定了农耕文明中心化的发展模式。二是宗教传播与陆上贸易驱动下的跨域交流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转向跨欧亚文明的集聚与传播。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文化中心由河谷地带扩展至贸易通道。西亚地区的巴格达、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成为连接欧亚文明的交汇点；南亚的德里则在佛教与伊斯兰文化的交融中，发展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东亚的敦煌以其丝路要塞的地理区位，承担了沟通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角色。三是海上交通兴盛与近代转型驱动下的沿海扩展阶段，文化中心的内涵在现代贸易、军事等影响下，转向与全球文化的融合、改造与再传播。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图5）至近代全球贸易体系的

成熟，亚洲文化中心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位于波斯湾顶点的西亚城市巴士拉因海上贸易而兴起，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南亚的孟买依托殖民港口体系与民族工业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与文化核心；东亚的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④的盛况，是当时世界海洋商贸的中心；而东京则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以教育与科技现代化实现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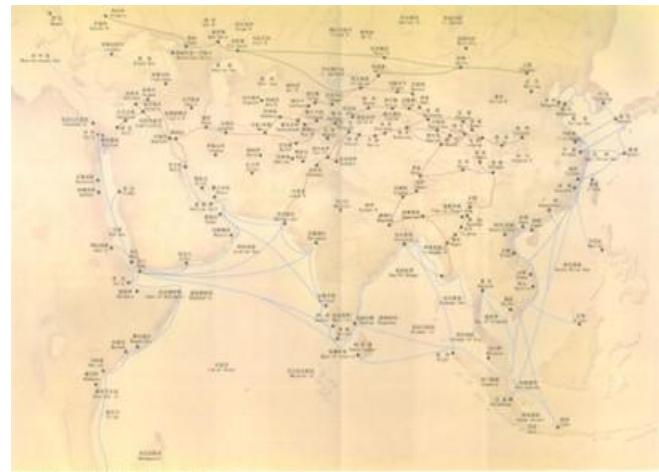


图5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来源：参考文献[19]）

亚洲文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演进经历了由“内陆河谷—商贸通道—沿海港口”的转移，形成“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并行”的格局，其驱动力从自然地理与农业条件转向文明交流与交通贸易，同时也受到了思想观念与制度变革的持续影响（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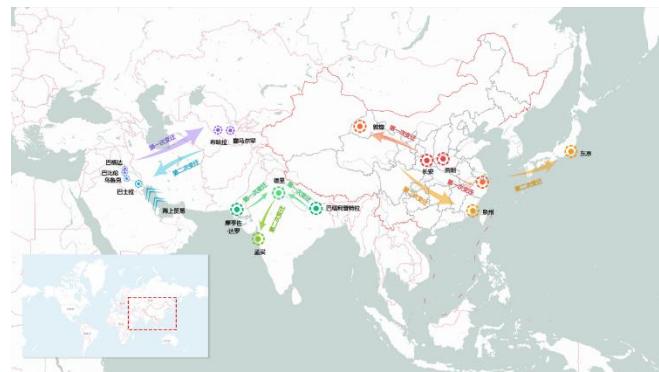


图6 亚洲（局部）文化中心城市变迁示意（审图号：GS(2024)1158号，底图无修改）

2.2 文明发展阶段与文化中心城市的演进

2.2.1 神权崇拜、王权统治的早期中心职能

^① 位于今伊拉克，是苏美尔文明（约公元前4000年）的古老城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后被废弃。

^② 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位于今巴基斯坦，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的重要城市。

^③ 巴塔利普特拉(Pataliputra)：位于今印度巴特那，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首都。

^④ 出自北宋翰林学士李邴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描绘了泉州帆樯如云、商贾辐辏的繁华景象。

早期文明阶段中，城市的发展与神权、王权的统治结构密切相关，文化中心城市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空间象征，也是社会秩序与宇宙观念的物质体现。

其文化中心城市的职能演进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神权主导的宗教祭祀阶段，文化中心城市主要以宗教祭祀中心为主。两河流域的乌鲁克以圣区埃安娜(Eanna)神庙群为中心，集神殿、仓储与行政功能于一体，反映宗教与政权合一的社会结构；尼罗河流域的底比斯通过大型祭祀与节庆活动强化法老权威，以卡尔纳克神庙为代表的宗教建筑群成为与神沟通的重要场所；中国商代的殷墟以甲骨文记录的祭祀体系闻名，宗庙与王宫并置于城市核心区，维系神圣秩序与社会稳定。二是王权主导的政治转型阶段，国家体制的确立使文化中心城市转向政治、军事与行政核心。两河流域巴比伦的宫廷制度与法典编纂确立了王权的制度化功能，成为古代的政治与文化枢纽；波斯波利斯的艺术风格与建筑形式融合多民族风格，展现出帝国的多元文化秩序和统一的文化认同；中国西周的宗周则以宫城、礼制区为核心，成为国家权力运作与文化传播的中心。

早期文明阶段的文化中心城市演进体现了文明从宗教象征向制度秩序的转化过程，文化中心城市也由信仰与祭祀的场所发展为国家文化治理与社会认



同构建的空间载体（图 7）。

图 7 早期文化中心中心职能演进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2.2.2 信仰传播、知识革新的中世纪城市功能

古典至中世纪时期，随着宗教体系的发展与学术系统的形成，文化中心城市成为信仰传播的枢纽，同时也是思想与艺术创新的展现。

其文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信仰教化下的知识传播阶段，文化中心城市主要作为宗教传播中心。印度的那烂陀寺以系统化的佛教经论教育著称，吸引东亚与中亚学者往来求学，形成跨地域的思想交流网络；埃及开罗在法蒂玛王朝时期设立艾资哈尔学府，将伊斯兰经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奠定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的开封、奈良等城市在佛教与儒学的双重影响下，发展为辐射周边的区域性文化中心。二是学术体制

下的思想创新阶段，大学制度与人文思潮的兴起使文化中心城市成为学术与艺术核心。巴黎、牛津等地的大学通过经院哲学与学术自治形成学术共同体；维也纳在 15 世纪后逐步成为中欧重要的学术中心，促进区域文化交流；意大利的米兰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为艺术与学术中心，尤其体现在绘画、雕塑与建筑等方面，汇聚了如达·芬奇和布拉曼特等艺术大师，推动了理性思维与艺术创作的融合，是艺术革新的代表性基地之一。

古典至中世纪时期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从以宗教信仰向学术求索转变的趋势，文化中心城市职能亦随之由宗教教化和信仰传播转为理性思辨和知识革新（图 8）。



图 8 5—15 世纪文化中心中心职能演进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2.2.3 文化建设、文脉代表的近现代文化中心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与全球化发展推动文化中心城市职能再次转变，城市成为现代化文化建设与国际名片的空间载体。

其文化中心城市的角色转变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现代转型下的文化发展阶段，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开始关注于市民需求与资本市场。18 至 19 世纪，伦敦、巴黎、柏林等城市依托工业化发展和公共教育体系，奠定了现代文化体制的基础，文化设施逐渐由贵族与教会私有化转向社会与民众公共化；纽约依托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成为全球艺术与学术研究的交汇点，摩天楼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建筑在满足市民需求的同时，展现了作为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上海则通过现代工业与传媒创新，在保护历史遗产的同时，积极进行了现代化建筑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二是全球网络下的形象塑造阶段，文化中心城市成为民族形象代表与国际交往中心。洛杉矶以其全球化的娱乐产业成为电影和娱乐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推动了音乐、时尚等领域的文化创新与传播；迪拜将现代化建筑与全球商业文化进行融合，发展为全球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枢纽；新加坡依托自身独特的城市规划，将“花园城市”融入文化理念，形成了现代化与生

态兼容的文化身份，推动了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文化交流。

近现代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经历了从文化事业建设到全球形象塑造的转变，推动文化普及，塑造文化标志，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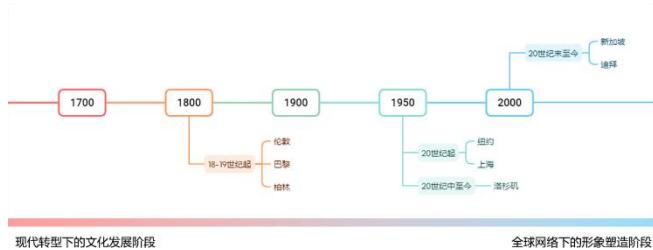


图 9 近现代文化中心城市职能演进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3. 城市发展史：文化中心城市映射文明内涵

自古以来，文明的精神内核往往通过城市这一物质载体进行表达与传承，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正是在其具体空间形态的生成与演变中得以实现。

纵观古今内外，西方城市由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宗教中心演化为中世纪的教会城市，再经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转向理性规划与公共文化主导的现代都市，如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形成以开放空间和市民社会为核心的文化格局；中国城市则自先秦礼制都邑起步，经隋唐的宏观规划、宋代的商业繁荣、明清的轴线秩序与市井文化并行，呈现由侧重礼制向侧重市井的转换。总体而言，西方城市重在理性与开放，中国城市强调秩序与和谐，二者共同揭示了文化中心城市由权力象征向公共文化空间转化的历史脉络，成为代表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一环。

3.1 国外文化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

3.1.1 历时层积、节点联结的城市文化意象

在西方城市语境下，对于城市意象的形成与感知主要来源于城市的视觉结构^[20]。因此就国外文化中心城市而言，其空间生成和文化意象侧重于在城市内部空间的视觉层面下，城市形态的时间层积和动态行进中的空间感知。

如罗马的城市文化意象根植于古典时期主题重复式的城市平面，经由中世纪形式自由的发展，在巴洛克时期的轴线规整下形成（图 10）。16 世纪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对罗马的规划改造，设计了节点联结的城市结构，通过建立主轴线、方尖碑

与广场的放射状连接体系，使城市文化空间之间具有了张拉性（图 11），从而通过轴线和视觉引导实现城市空间文化意象的统一^[21]，塑造了“永恒之城”的整体形象。维也纳在 19 世纪的近现代城市规划中，为解决原有防御工事与城市交通之间的矛盾，在拆除城墙及护城河区域的基址上，兴修环城大道（Ringstrasse），通过剧院、博物馆、大学、议会大厦等公共文化建筑与广场节点的串联，在旧城与新城区间构建了一条公共空间带^[22]（图 12、图 13）。



图 10 18 世纪罗马城局部平面（图源：The New Plan of Rome by Giambattista Nolli, 1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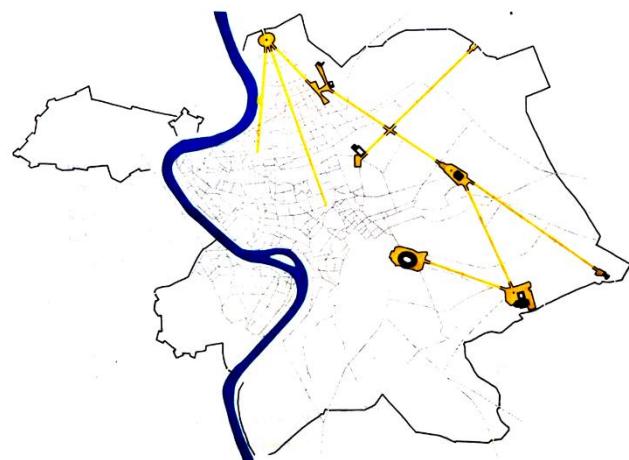


图 11 16 世纪西克斯图斯五世改造中的轴线与公共节点关系（图源：参考文献[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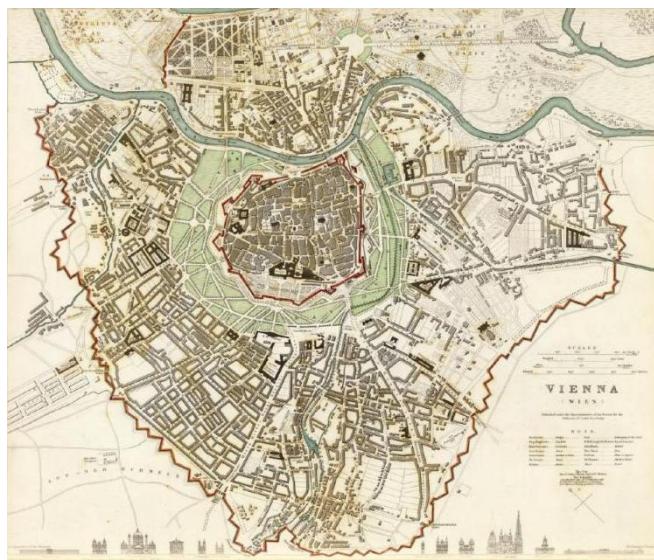


图 12 1833 年维也纳平面图，其中绿色为护城河区域
(图源: Vienna. Wien Drawn by W. B. Clarke. Engraved & printed by J. Henshall. Published by Baldwin & Cradock, 1833.)



图 13 维也纳环城大道新建建筑及被大道串联的公共空间
(图源: 作者自绘)

城市文化空间作为“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23]（“the sedimentation of layers over time”），其整体的文化意象是不同历史的不断叠加、整合与更新演绎，并在城市空间层面上以联结具有深厚文化记忆的节点性空间。进而将时间维度转化为可体验的场所，使文明的连续性与独特性在漫步中被感知与内化，以此凝聚集体记忆、激活文化认同。

3.1.2 理性逻辑、规划为体的城市空间布局

在城市整体尺度中，西方城市空间的布局以功能为导向，强调理性逻辑与空间秩序，并形成了以几何秩序、轴线结构和空间统一性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城市以明确的布局原则，清晰可读且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形态，服务并影响公共文化生活。

古希腊雅典卫城的高位布局与下方集市（Agora）的两处文化空间分区关系，构成了信仰空间与市民公共生活的空间序列。其建筑形态基于简单的几何造型，而在布置上结合所处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空间结构（图 14）。米利都城（Miletus）则在古希腊城市规划师希波丹姆斯（Hippodamos）的规划影响下，进一步将几何理性引入城市规划，采用方格网街区与统一尺度^[24]，以多次重复的模式构建了秩序与逻辑统一的空间形态，其公共文化空间位于城市中心（图 15），成为希腊化城市、罗马古典城市乃至近现代欧美城市的原型。19 世纪巴黎奥斯曼改造则以轴线延展的形式，结构性设计了国家象征性空间的框架，并提供了串联城市文化空间和进一步延展的可能性（图 16）。巴黎的改造设计通过宽阔大道、连续街廊、纪念性广场与视线轴线的系统构建，以开阔通道和统一立面展现了现代都市形象，成为现代规划的典范，也宣示了城市国家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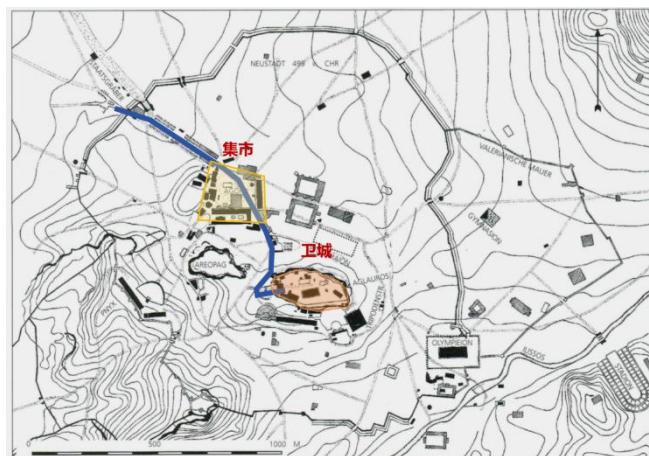


图 14 古希腊雅典总体城市形态
(图源: 改绘自 Stadtplan von Athen by J. Travolas, Bildlexikon zur Topographie des antiken Athens (Tübingen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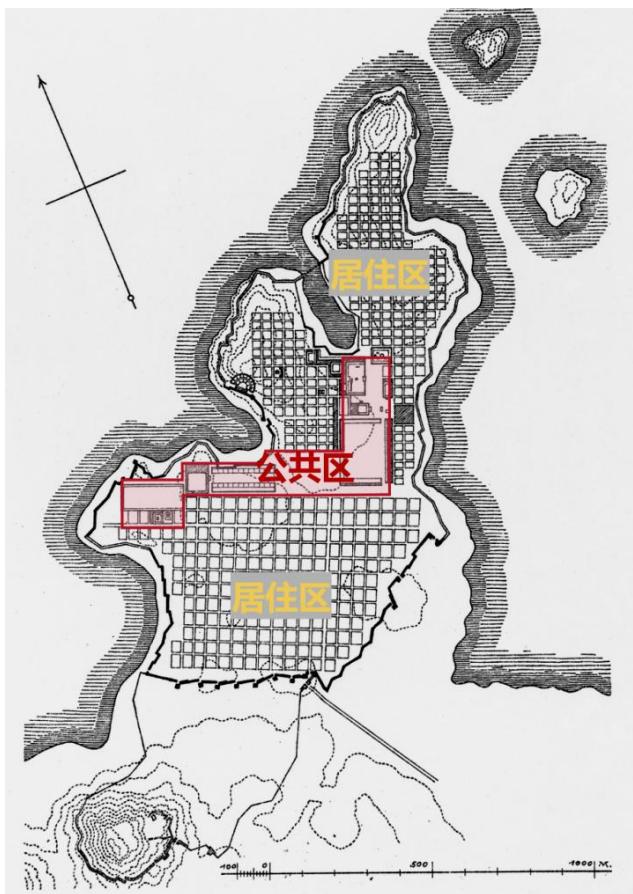


图 15 米利都城平面及公共区分布
(图源: 改绘自 Plan of Miletus Griechische Stadteanlagen Gerkan, A. Published: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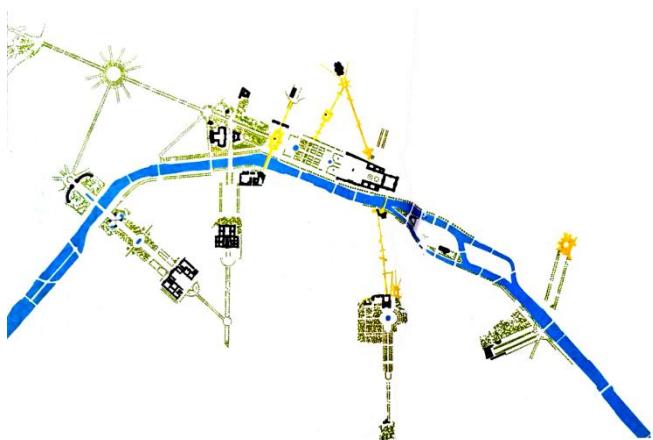


图 16 巴黎奥斯曼改造计划的延长轴线 (图源: 参考文献[21])

理性逻辑影响下的文化中心城市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规划秩序、功能分区、公共空间汇聚的城市空间布局模式，并在不断迭代中，生成具有时代精神与文明象征意义的城市形态。这种规划将社会理想等抽象价值空间化、制度化，通过秩序性的空间框架引导公共行为，从而激活特定的社会运行模式，维系与之相应的文明内涵。

3.1.3 生活主导、街巷汇聚的公共广场空间

在城市局部尺度中，西方城市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广场为核心的公共生活模式，其是市民政治、贸易往来、日常生活的开放活动场所。城市局部空间的组织呈现出以公共生活节点主导，街巷汇聚、广场引入的传统结构。城市广场也顺应当地的功能需求、文化氛围，塑造出独特的公共文化空间。

锡耶纳 (Siena) 作为典型的意大利中世纪山城，其城市结构由多个行政区构成，各区因地形起伏形成独立又互补的小广场体系。这些支离分布的生活单元最终在城市中心的坎波广场 (Piazza del Campo) 实现汇聚，形成向心性的空间结构 (图 17)。每年的“赛马节” (Palio) 让这一空间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重大节庆的场所，是市民文化的具体象征。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 (图 18)。圣马可广场的建设从 10 世纪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从市场与宗教功能逐渐向政治与社会功能动态转化^[14]。作为城邦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及城市入口空间，它连接了圣马可大教堂、总督府、图书馆与临水平台。广场周围的连拱空间为咖啡馆、商铺与步行活动提供连续界面，使其成为市民与旅行者共同体验威尼斯生活与身份的公共客厅，并进一步向城市内部延伸。

通过街巷导入与空间聚合构筑的公共生活广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城市日常脉络、节庆仪式与公共艺术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精神的核心空间。进而催化了学术知识、艺术灵感、文化思想、商业创新等日常碰撞，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成熟，激活了基于集体参与的城市文明活力。



图 17 锡耶纳坎波广场 (图源: 参考文献[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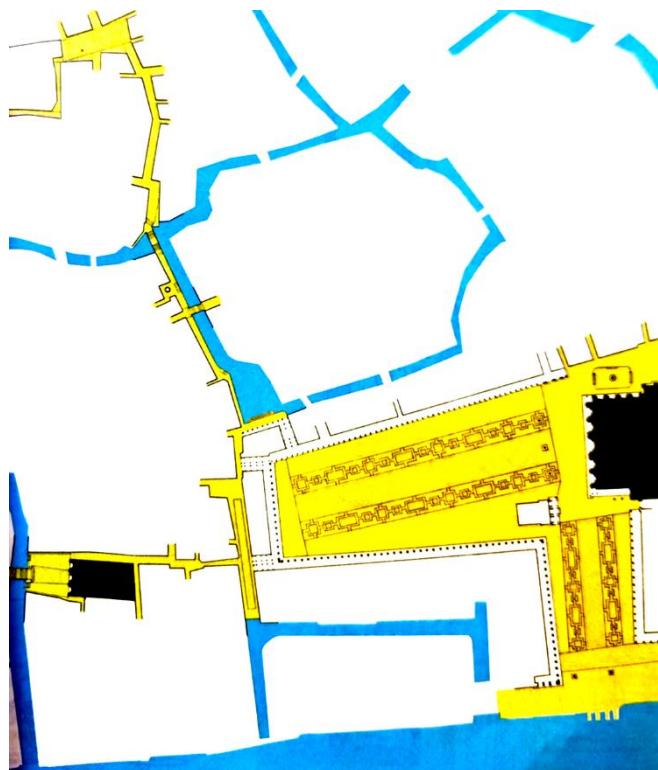


图 18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以及与周边街巷的联系
(图源: 参考文献[21])

3.2 中国文化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

3.2.1 天人合一、山水营城的城市人文精神

以精神文化价值及意义为导向的城市人文空间建设，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区别于西方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的影响下，城市及周边的山水环境，是城市人文精神表达的重要因素，即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选址和总体布局强调山水营城的手法与特点^[25]。

宋代杭州是山水营城的典型代表。以西湖为核心的山水格局与城市肌理相互渗透，苏堤、白堤等公共空间既联通城市又融入自然，营造出诗意图居的江南城市生活场景，成为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南宋定都后，政治中心与自然景观融合，凤凰山、吴山等自然山体与城郭共同围合城市空间。除了都城外，山水环境同样是地方城市营建中的重要元素。如清代福州亦呈现山水相依、城居自然的格局：府城背山面江，依于山、乌山、屏山“三山”构成城之骨架，闽江水道流经城旁，形成“山环水抱”的格局（图 19）。城市空间结构以山水属性赋予文化表达，最终塑造城市整体的人文意象。

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重要文化逻辑源自“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城市形

白佳林等, 2025

态与城市整体人文精神的塑造更注重从自然格局中寻求秩序和源头^[26]。构建了一套将宇宙观、自然观与人文秩序相联结的意义系统，使“和谐共生”的文明理念在可居可游的体验中被持续激活与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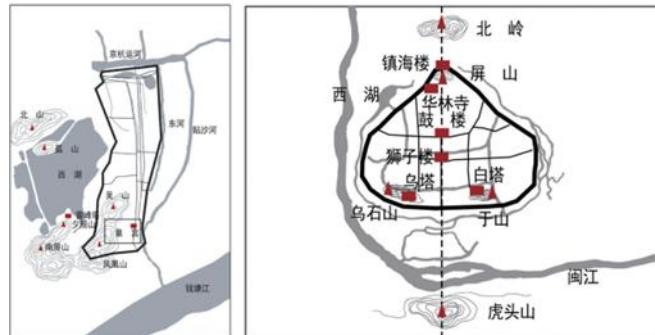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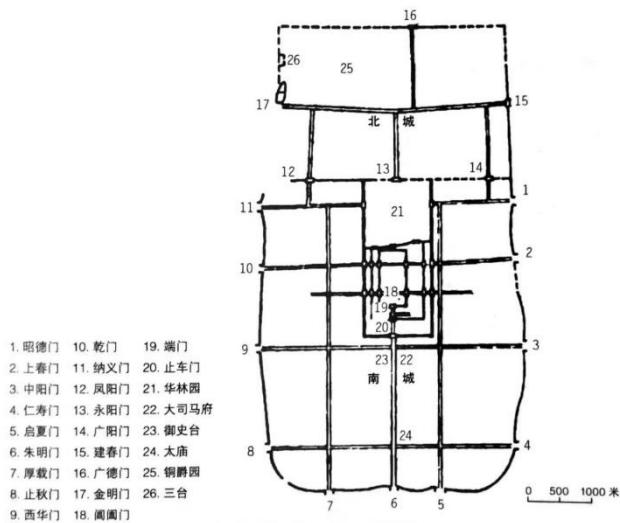
图 19 南宋临安城及清福州城山水格局（图源: 参考文献[26]）

3.2.2 礼制秩序、中轴对称的城市总体格局

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核心规划逻辑在于礼制秩序的体现。自先秦《周礼》思想肇始，城市规划遵循“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通过中轴对称、宫城为尊、里坊分区、朝市分设等空间结构，将伦理秩序、宇宙观念等实现场象征化的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节点，形成了以宫殿轴线为城市中轴结构（图 20），突出“居中为尊、尊卑有序、和谐对称、中正平和”^[27]的空间秩序特征。唐长安则将礼制与空间系统推进至成熟。城市以宫城、皇城、外郭城三级空间为体系，南北中轴贯穿朱雀大街，坊市分隔、左右均衡、尺度宏大，是礼制秩序和文化精神在空间层面的具体体现。明清北京承袭元大都基础，将礼制轴线与皇权象征推向极致。自永定门至鼓楼贯通南北中轴，以紫禁城为核心，皇城与内外城层次递进，形成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空间秩序相统一的层级空间结构。钟鼓楼、社稷坛、太庙、天坛、先农坛、地坛等仪式建筑位列其上，使中轴成为宇宙秩序、国家仪典、伦理秩序的空间体现，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这种空间格局使城市秩序化、象征化，成为文化的载体。礼制的空间化表达，保障了文化的延续与社会伦理的稳固，使中国古代城市在千年更迭中始终保持精神统一与秩序和谐，激活和巩固了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使城市的中轴既是礼制的轴线，也是文化认同的轴线。



性开放”，催生了市民文艺，为社会整合与文化创新注入了来自民间的鲜活力量。



图 21 北宋东京城上元节及中秋节公共活动主要空间
(图源：参考文献[31])

3.2.3 节庆介入、街市串联的公共市井空间

中国传统城市的文化空间还体现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文化与空间体系。周期性的节庆活动主导了市民的公共活动，而街巷既是市井经济的脉络，又承担文化展示与节庆庆典的舞台功能，形成了中国城市独特的公共空间逻辑。

唐代长安实施严格的里坊制度，但节日时期是官民同乐，礼俗并举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的重大时间节点^[28]。长安城中街道、市场、寺庙、曲江是节庆期间的重要公共空间，盛唐时期，上元节灯会期间，坊门开放，弛禁燃灯，上街娱乐已成定式^①。北宋是城市从封闭的里坊体系向开放的街巷体系转型的时期，城中居民频繁参与到节日庆祝中，“时节相次，各有观赏”^[30]，市民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购物、装点、百戏、关扑等市井活动主要发生在街巷当中^[31]

（图 21）。明清时期，北京城居民岁时生活与城市空间具有极强的互动关系^[32]，街巷承载了节令庙会、灯会、游行、京戏表演等民俗活动。如明末上元节灯市，“在东华门东，长二里”，“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罢也。灯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灯也”^[33]，反映出其街市公共空间的盛况。

中国传统城市公共空间并非中心结点式的广场，而是通过街肆、巷陌、桥市、寺庙、庙会形成的网状公共市井空间。通过“时间性节庆”引导“空间

① 宋代王溥所撰《唐会要》卷 49 记载：“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岁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见（宋）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862.

4. 文化中心城市“文明-城市”关联发展规律

城市的形成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文明则赋予城市以精神内核与发展动力，二者在悠长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文明-城市”的关联发展规律。

4.1 文明发展对文化中心城市更迭的推动作用

文明驱动文化中心城市更替的过程，既体现在空间格局的演化，也反映于职能角色的升级。从洲际视角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推动了文化中心城市的分布与迁移；从历史阶段看，文明阶段的更替又重塑了文化中心城市的杜会职能与文化象征。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经济基础与文明交流频率的差异，使不同大陆的文化中心城市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轨迹。总体而言，文明交流越频繁、经济与观念越开放，文化中心城市的更替速度越快，地理跨度也越大。

具体来说，文明系统内部复杂的动力机制推动了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与更迭（图 22）。物质基础层面，自然环境与交通网络共同构建了文明发展的基础框架。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文化中心的萌芽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条件，而交通网络的扩展则不断重塑着城市的空间格局，推动文化中心从内陆腹地向沿海枢纽迁移，从孤立据点向网络节点转型。交流互动层面，贸易、战争与外交等活动构成了推动文化中心迁移的直接动力。贸易往来建立起文明交流的经济脉络，战争征服往往带来文化格局的强制性重组，而外交互动则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制度借鉴与融合，这些高频率的交互活动共同促成了文化中心在空间分布上的动态调整与权力转移。思想观念层面，宗教传播、思想革新与科技创新共同决定了

文化中心的精神高度与发展潜能。宗教信仰为城市注入持久的精神凝聚力，思想革新推动城市职能从祭祀中心向治理中心演进，而科技创新则不断拓展着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边界，推动城市向知识创新枢纽转型。这三个层面相互渗透、彼此强化，形成了有机的驱动系统，推动了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在空间格局上经历从封闭到开放、从内陆到沿海的系统性迁移，在职能性质上实现从祭祀到治理、从传统到创新的根本转型，完整展现了文明演进与城市发展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辩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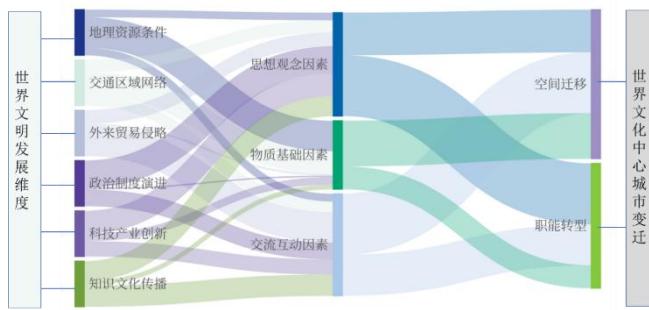


图 22 文明发展对文化中心城市更迭的推动作用示意图

（图源：作者自绘）

4.2 文化中心城市空间对文明演进的激活效应

文明发展的多重动力塑造了文化中心城市的格局与功能，而城市空间在多层尺度上亦持续激活着文明的演进。通过对中西文化中心城市空间演进规律的比照可以发现，尽管二者在文化源头与城市语境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维度上，都能够以宏观精神文化、城市整体空间、城市局部空间三种尺度构成城市文化空间的层级体系，同时也对文明演进具有激活效应（图 23）。

在宏观精神文化尺度上，城市空间与地形格局、自然环境或历史结构相互嵌合，通过山水、轴线、地势、城廓或历史肌理构建文明意象与文化景观，唤起人们对文明起源与文化长度的感知，构建文明宏观叙事下的观感场景，使文化成为可视、可触、可进入的精神场域，从而激活文化感知；在城市整体空间尺度上，城市以明确的组织原则、公共结构与秩序体系塑形社会运行的框架，通过规划体系、礼制轴线、广场制度与功能分区等结构性设计，形成文明秩序的空间表征，从而激活文化认同，城市空间在此成为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可视化表达；在城市局部空间尺度上，通过街巷、集市、广场等

日常或节庆生活场所，城市空间为公共交往提供了场所，使人们在日用之间进入文化、参与文化、再造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生活的激活。城市不仅是承载文明的场所，同时也在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下，为文明基于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的持续演进提供了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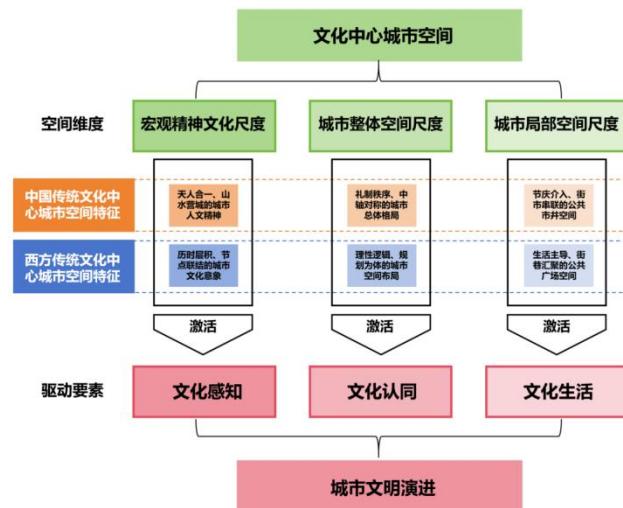


图 23 文化中心城市空间对文明演进的激活效应示意图

（图源：作者自绘）

5. 结语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文明的演进与城市的空间建设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其本质上是一部“文明”与“城市”相互定义、共同演进的历史。即文明为城市灌注灵魂与方向，城市则为文明提供载体与形态。

本文通过对这一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其演进并非单一动力驱动的线性过程，而是自然环境、经济网络、制度思想与空间实践等多重维度复杂交织的结果。从文明格局的变迁，到城市空间的塑造，

“文明-城市”关联规律展现了一种动态的、层积的生长逻辑，具体来说，即文化中心城市既是特定文明成果的凝结与展示，也是不同文明间持续对话、融合与创新的活性节点。理解这一规律有助于深化对人类文化遗产空间载体的认识，也为思考如何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推动文化传承、促进文明互鉴、营造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城市文化，提供了贯通历史与未来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 [1] 唐莹莹,赵宗.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及对北京的启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02):19-25.

- [2] 李建盛. 北京: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中的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建設[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1(03) : 71–78.
- [3] 金元浦, 王林生. 北京世界城市与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研究综述[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0(04) : 40–49.
- [4] 刘士林. 江南文化中心城市规划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02) : 17–25.
- [5] 金哲松, 陈方, 李毅. 文化中心城市建设与文化产品贸易发展[J]. 现代管理科学, 2015, (06) : 9–11.
- [6] 应申, 侯景洋, 周钰笛, 等. 基于唐宋文人足迹集聚性分析的中心文化城市变迁[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0, 22(05) : 945–953.
- [7]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8] 皮特·N·斯特恩斯等. 世界文明史[M]. 赵铁峰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 [9] 刘文明. 文化自觉与世界文明史书写[J].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06) : 138–145+160.
- [10] 菲利普·J·阿德勒. 世界文明史[M]. 林骧华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 [11] 杨清.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1) : 24–33+187–188.
- [12] 韦森, 苏映雪. 世界文明史比较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J]. 社会科学, 2024, (09) : 36–47.
- [13] 毛曦.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 (02) : 71–81+159.
- [14]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15]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6] 彼得·克拉克. 欧洲城镇史[M]. 宋一然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5.
- [17]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 [18] 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 [19] 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28–9.
- [20] 凯文·林奇. 城市的印象[M]. 项秉仁,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2.
- [21] 埃德蒙·N·培根. 城市设计(修订版)[M]. 黄富厢, 朱琪,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85–86+192–195.
- [22] Winkler T. Vienna's Ringstrasse: a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sociopolitical values[J].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2021, 20(3) : 269–286.
- [23] Foucault M. L'archéologie du savoir[M]. Gallimard, 1969: 12.
- [24] 王建国. 城市设计(第4版)[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21: 1: 7.
- [25] 高元, 王树声, 张琳捷. 城市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研究进展与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 (06) : 43–49.
- [26] 王树声, 高元, 李小龙. 中国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 (01) : 27–32.
- [27] 吴良镛. 中国人居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154.
- [28]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104.
- [29] 赵昕宇. 唐长安城节日活动与空间秩序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0]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杨春俏, 译.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20.
- [31] 邓依丹. 节日活动影响下的北宋东京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2.
- [32] 张勃. 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0, 11(00) : 119–128.
- [33] [明]刘侗, 于奕正, 周损. 帝京景物[M]. 孙小力, 注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